

K260.6
20
2

1958.8.3

中国现代史

史料学

何东著

求实出版社

B

473059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

张宪文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22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43

书号: 11099·292 定价: 1.80元

目 录

绪 论	(1)
一、说史料	(2)
二、关于“史”和“论”	(4)
三、关于“博”与“专”	(8)
四、整理史料需要具备的知识	(12)
第一章 史料的分类和目录学	(17)
一、史料的类别	(17)
二、目录学	(23)
三、目录学与现代图书资料检索	(26)
第二章 关于中国现代史目录	(32)
一、文件、档案	(33)
二、报刊	(35)
三、回忆录	(48)
四、书籍	(55)
第三章 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66)
一、搜集史料的顺序	(66)
二、搜集整理史料要有科学态度	(71)
三、基本史料阅读法	(73)
四、普通史料的汇集	(81)
五、专门史料的搜集	(88)
六、史料的整理	(91)
七、几个具体问题	(96)

第四章 人名知识	(104)
一、历史书中的人名问题	(104)
二、现代人物的姓名问题	(108)
三、书籍和报刊文章中之名误	(115)
第五章 地名知识	(119)
一、地名的命名	(121)
二、地名的变更	(125)
三、地名的别称和简称	(131)
四、地名的转译	(133)
五、书写地名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135)
第六章 年代学知识	(147)
一、年代学和古时的记年方法	(147)
二、现代史料的年代问题	(156)
三、历史人物的生卒年问题	(166)
第七章 职官知识	(172)
一、清代中央和地方的官制	(173)
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政治机构	(177)
三、国民党政府政权机构	(185)
后 记	(194)

绪 论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是为学习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人介绍一些史科学知识。

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为中国现代史。

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起止，专家们的意见尚不一致。有一种意见认为，从1840年到1949年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都是中国近代史，1919年至1949年这一段作为中国近代史下编，或者称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才是中国现代史。近来又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应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开端。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个人见解要坚持，只是按一般通称，把1919年至1949年这一段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

中共党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共党史应以中国现代史作背景，中国现代史应以中共党史为中心。中共党史不是一般的专史，当然它也不同于断代史，中共党史有它的特殊性。比较起来，中共党史更接近于断代史。因此，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必须就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广泛地进行研究。

历史研究要有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要具备多方面的基础知识。史科学是讲究搜集、鉴别、整理和利用史料

学问，属于历史研究法范围，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史学基本训练的一种。掌握史科学的基本知识，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有很大的重要性。

一、说 史 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资料、原料。史料不具备或不确实，就无法进行历史研究，无法写历史。

“史，记事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古时的史官的任务就是记事实（记言、记行），史书也就是记事实的书。现在的历史研究也是根据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写出历史，以供流传，以教育后代。

过去的事实叫做历史事实、史实，即过去实际发生之事，在当时来看，就是时事。史料就是历史事实的记载和表示历史事实的实物（文物和遗迹），都是前人前事留下来的，现在成了两大类史料，即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除了这两大类之外，还有一种史料，叫做口碑，这种以口相传的史料经过一段时间也会变成文字史料，实际上还是两大类。史料还可能有这样的区分，即有意留下来的史料和并非有意留下来的史料。还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伪造史料，或是为了某种目的而销毁史料。但是，不管怎样，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前人的活动，都会在世界上留下痕迹。史料中会有歪曲事实的东西，某些史料会有被湮没的情形，但客观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历史的真象总是可以研究清楚的。

历史研究工作的基础就是要搜集大量的史料，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正面的和反面的以至伪造的史料，进行鉴别和

整理，搞清历史事实的真象。著史要秉笔直书，根据事实说话，史料越充分，事实越确凿，对事实的叙述越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则著史的任务、历史研究的任务也就越完成得好。历史研究当然不能以考订史料为满足，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给人们以教益。但是，只有根据事实，实事求是，才能把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阐述清楚，这样的史书，才越有说服力，越为人们所喜爱和接受。历史的科学性在于它根据事实，事实不能伪造，伪造的事实不能长久。史书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真实是一切史书取信于人的条件，离开了或违背了历史事实而作的史书，终究不能成为信史。

马克思写过几本非常著名的历史著作，他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恩格斯说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恩格斯：《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德文版序言》）。

我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流传于世。他搜集和利用了当时所见到的丰富的史料，史记一书在叙事方面不避权贵，不怕罪祸，敢于揭发当权人物的罪恶，因此它曾经被称为“谤书”。魏明帝曹叡认为司马迁“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但王肃认为“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三国志·王朗传》）。刘知几说：“良史以实书直录为贵。”他在《史通·直书》篇中讲了因直书而被祸的事例之后，非常感叹地说：“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以上是说一部史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实录直书，而

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作者要有勇气以外，就是作者对史料要审实。

二、关于“史”和“论”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现在研究历史的人一般都把它们看作是史料，如翦伯赞云：“二十四史，中国历来皆称为正史，但在我看来，不如称之为史料集成”（《史料与史学》）。这是很正确的见解。梁启超在此以前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旧史的作者，无一不认为他们写的是历史，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史学。这些作者的历史观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有些人只肯把自己的写作叫做“述”，不叫做“作”。虽然有这些情况，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自己写的是史，他们的前辈作者写的也是史。

《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然而司马迁《报任安书》又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资治通鉴》，从作者司马光自述的编书的目的和宋神宗给它的定名，可以看出它是专门讲治乱兴衰的历史，给统治者以借鉴的。

这些史书，无论是纪传体或编年体，都是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有所发明，有所论的。不仅它们的论赞部分是论（如《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曰，《后汉书》有论曰，又有赞曰），就是在长篇叙事中，也渗透了作者的意见，渗透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褒贬，从而反映出作者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见解。

过去还有一种专门论史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书，把它列为史评类。较早论史的文章如贾谊的《过秦论》、陆机的《辨亡论》。宋明以后开始有论史的专书，如吕祖谦的《左氏博议》，又名《东莱博议》（吕祖谦号东莱，此书乃就《左传》上的史事发议论）。张溥的《历代史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这些著作中，如吕祖谦的《东莱博议》议论比较简单、空泛，并无多大价值。其较有价值者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总的说来，封建时代的此类书籍并不能科学地评论历史，又容易引导读者到奋臆空谈之路。研究历史的人不必学做这样的文章。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许多学者有见于清初文字狱之惨烈，又不满意宋明以来学者专谈义理的学风，于是集中精力于古籍的钻研与考订，他们遵守汉代的经说，崇尚汉学，非薄宋学，于是考据学大盛，在经学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成绩。在史学方面，乾嘉学者也是致力于鉴别史料，考证史事。校勘史籍上的文字，在这些方面曾经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功夫仅限于史料方面。这种学风影响后来至巨，乾嘉以后的学者研究历史，专门讲究“无一字无来历”，集前人现成史料加以排比，就成为他们的著作，不进行分析，无创见，甚至无视新发现的实物史料，不承认不相信它们的史料价值。这种情况直到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后才稍有改变。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兴起，旧史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以提倡整理国故、钻故纸堆来引导青年脱离现实，于是又有一批学者和青年跟着胡适作历史考据。胡适的学术研究是以实用主义为依据的，他作历史考证的方法是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

证”，由于他有那样的政治目的，他所依据的实用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反动哲学，他的“科学方法”也并不是科学的，所以胡适的历史考证在个别问题上不能说没有可取的地方，但整个说来是不值得肯定的。胡适的考据学和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是不很相同的。胡适的考据学给许多资产阶级史学家以不良影响，虽然他们在政治上与胡适有区别，但他们在胡适的影响下，以为史学就是整理考证史料，除了研究史料，没有别的事情，这显然是错误的。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意义。

全国解放后，史学界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史学领域内，诸如考古、通史、断代史、专史、人物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十分锐利的武器。史学界提倡既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又要详细占有材料，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历史现象，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焕发人们的革命精神。所谓论，除了这一层涵义，还有一种涵义，即上面讲过的史家的观点和论点，于是对论和史的关系，多数人都主张观点和材料应该统一，论点和史料应该统一。遇到具体问题，这些人对史和论的关系的理解却不完全一致。史学界对此曾有过几次讨论。后来在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有人提出了“以论带史”，“反对史料挂帅”等口号，他们实际上是认为史料是无足轻重的，可有可无的，只要有了“理论”，就可以就历史问题说话，结论是现成的。他们把钻研

史料和白专划等号。“以论带史”的口号很快被一些人所接受，于是史学界出现了不少概念化和武断的文章，任意贴标签、扣帽子，徒托空论却盛气凌人。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刻苦钻研实事求是的学者只好束手。在这期间，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辈们仍然实事求是地做研究工作，给我们作了榜样。

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应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坚持史论结合，但是过去党史工作者在论和史的关系上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也有人主张“以论带史”，于是在党史教学和研究中，每有这种情况，以为抽象地讲理论，孤立地讲党的路线方针，列条条，背条条，就算是理论水平高，而艰苦地搜集史料，力图从史论结合上说明问题，则被目为理论水平不高，或“史料挂帅”。由于以上这种情况，影响了教学效果，妨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在科学研究方面，则不少人裹足不前，有些勤于研究的人，也常常由于上述这种客观原因出不了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历史科学空前繁荣，中国现代史学术领域也出现了新气象，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正确的阐述，人们勤于发掘史料，善于进行理论分析，把过去搞混乱了的或搞颠倒了的历史作了澄清或纠正。学术空气十分活跃，科学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

现在人们一致认为“以论带史”的提法不妥，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史论结合。同时也认为应避免另一种偏向，即只注重个别史实的考证，只致力于史料的搜集。这种偏向以为只要有了史料，不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史料进行科学分析，

对历史问题无需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论阐述，这样会导致认为历史研究就是搞史料。不论这种偏向现在已否到严重程度，都应引起我们注意。

以上从说明史论关系这个问题的来历，史论结合的重要性，说明不注意搜集史料，贴标签，发空论，固然要不得；只注意收集史料，钻到史料堆里出不来，也是不可取的。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给人们以正确的历史知识，鉴往知来，不能以熟悉史料为满足。

三、关于“博”与“专”

重博学还是重专精，从来意见不一；在不同的时代（时候），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样；就具体人来说，各人为学的方向也不一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各异。

人类的知识太广，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按照科学分工，一个人只能专一门，就是在一门学科范围之内，一个人还必须有所侧重，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说到历史学，首先就是史料浩如烟海。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史料，据梁启超统计，史部之书，见之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共二千一百七十四部，计三万七千零四十九卷。

《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四库全书》编定后续出之书，属于史部的有多少，没有详细的统计，加起来恐怕也有数万卷。史部以外的群书，很多是可以视为史料或者是从中可以找到史料的，这些书加起来数目就更多了。一个人无论怎样聪明都不可能读完这许多书。单就纪传体的“二十四史”而

言，共三千二百五十九卷（据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统计），粗略读一遍，至少要数年时间。想全面研究一番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不仅卷数多，而且它包涵的内容是几千年复杂的中国历史。过去人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所以过去的学者，每有人以其治学的切身经验提醒后学，贵专精不贵博杂。

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史料，究竟有多少，很难说清楚。有关现代史的书刊，看来数目很多。现代技术进步，活字版、转筒机、影印、复印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使出版书刊比古代容易得多，书刊的翻印流传也比过去容易得多，因此关于中国现代史的书刊，非常之多，并且这些书刊出版至今，为时不久，失传的少。这些书刊虽然尚无人作过统计，但是可以想象其数量比中国古代史籍的数量要多。书刊史料是如此，其他种类的史料也是范围广、数量大，很难说清它的具体数量。

史料如此，历史上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按大类、大问题来分，数目相当多；按小类、小问题来分，数目就更多。研究历史要从基本问题开始。学习中国现代史，应就基本史料首先把各个时期的基本问题研究清楚，这种打基础的读书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史料，其中大部分是常见史料。常见的、容易得到的并不是可以忽视的，对于初学者，必须读过这些再及其他。可是往往有人因为它是常见的，内容又不难理解，学起来就漫不经心，不认真，不仔细，急于找新奇的材料，难得的东西，结果是走了弯路，浪费了一些精力。先研究基本史料，使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基本轮廓有清楚的了解，然后就可以选择某一个段落或某个专题进行专门研究。

段落以短为宜，问题以小为宜。在开始进行专门研究之时，首先要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社会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广泛搜集有关材料，下苦功夫，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研究成果。这就是专门研究的大致情况。专的好处是在一个专门问题范围内能获得较高深的知识。不仅如此，而且小范围内的专门知识是逐步获得本学科较深入的全面知识的阶梯。为学的过程大致是这样，但也不能绝对化。上面说专门研究的题目以小为宜，这是就值得研究的问题而言，是相对而言，不是提倡钻无意义的细小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我们开始进行专门研究以后，尤其不应忽视对基本理论的学习。专门研究要以本学科的较全面的知识为基础，在开始专门研究以后，仍要随时注意本学科的全面情况和新的进展。我们还必须懂得，在一个学科范围内从事专门研究时，常常要涉及其他有关学科，因此，从事本学科的专门研究还要具备一些其他学科的基本知识。知识面不广，常常会妨碍对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所以我们要正确处理博和约的关系，即知识的广度与深度的关系。我个人的意见是：知识面要广一些，但以专精为目标，不以博学为目标。一个人的学问搞得很博杂固然不好，而且就某一个人来说，他的博学总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现代，学问的门类很多，学科很多，要想门门通是不可能的，要努力做到博观而约取，约取而实得。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提倡博学，他说：“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现在的时代和那时不同，一个人不可能事事都知道，即使在明末清初那种生产和文化不发

达、知识较简单和信息量较少的情况下，一个人事事都知道也是不可能的。顾炎武有鉴于明末士大夫识见空疏，好发议论而昧于天下大势，他不赞成这种学风，他主张关心国家大事、经世致用。他历览二十一史及各地方志，还亲自到各地实地考察，了解山川形势、物产和赋役情况，纂辑了一部包含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大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有过“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之类的说法，大概是针对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和民间疾苦的人说的。梁启超说过，做学问的人切勿以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想要无所不知是不可能的（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2页）。我们切莫要想自己什么学问都有，什么事情都知道。毛泽东在论学校教育时说过，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能回答一半就不错了。在这个问题上，当教师的人都会有一些实际体会。这里讲的博和约的关系，除了讲清这个做学问的道理外，还为了申明，史料学这门学问，牵涉到的方面很广，如文学、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金石学、目录学、史学史、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沿革地理）等等，内容比较博杂，但总的目的是介绍一些史料问题的基本知识，有助于大家从事历史研究，研究中国现代史上的重点问题。这个讲义虽然经过参考其他史料学书籍，进行了比较和斟酌，按照我认为较为合理的系统编写，但内容难免还有些博杂，有些地方读起来还比较枯燥，但我估计到有些人会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读者对有些地方感兴趣不要紧，但希望大家不要把做学问的兴趣转移到博杂上去。

四、整理史料需要具备的知识

整理史料，除了要有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以外，还必须具备各种有关的专门知识，以保证史料的准确性。这些专门知识，有些是属于史学范围以内的，有些则不是，但与史学的关系密切。与史学有关的知识，范围很广，诸如文字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等，还有地质、气象、天文、历法、水利、制造等方面的知识，史学工作者都要对它们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就文学史料而言，首先要具有一定水平的语文知识才能读懂这些史料，这是自不待言的，即使是中国现代史的史料，用现代汉语写的材料，其中某些词语的准确涵义和句法结构，也有费解之处，需要一定的现代汉语知识才能了解。同时，现代的人做文章，有时也用文言或用一些成语典故。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没有古代汉语的知识也不行。

例如：瞿秋白《多余的话》一文内，有“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句话，瞿秋白并说这是清代一个汉学家说的。其实类似的话很早就有人说过。《宋史·刘贇传》有：“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宋史》卷三四〇，第10858页）有此知识，则可进一步领会瞿秋白的文意。前几年还有人认为，只有象瞿秋白这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人，才能在做文章时信手引用这句话。

又如：“革命”一词，现在是现代汉语的普通词语，但它又是古代汉语的词语，古时候以为帝王系受命于天，故称王者易姓曰革命，义意和今天的很不相同。在陶成章所订

《龙华会章程》、陈少白所著《兴中会革命史要》中，都曾说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自称是革命党，其来源有一个故事：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乘轮赴日，抵神户时看见日本报纸上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于是孙中山对陈少白等说：我们干的也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事，大家以后就自称革命党好了。经孙中山这样解释，革命一词便在革命党人中广泛使用起来。

但是，他们当时对革命二字的解释还没有完全超出《易经》的范围，^①后来才有将政治上经济上的大变革称为革命的意义。至于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必需具有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新社会的目标，这在汉语里更是后起之义，实际上已超出语文范围，是一个政治理论问题了。现在有人主张：农民革命不能称为农民革命，只能称为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不能叫做太平天国革命，只能叫做太平天国起义等等。我认为语文词语的释义和社会科学名词的解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词语的习惯用法同这个词语有关的理论系统更不能等同。否则我们平常作文和写史叙事都会发生困难。

又如“少年”一词，古汉语中是指青年男子，直到几十年前一般还是指现在所说的青年。五四时期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参加者多是青年，胡适文章中“少年朋友”一词多指青年，“少年先锋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是青年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和现今小学里的“少先

^① 《易·革》“彖曰：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